

· 特稿 ·

论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

田鹏颖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中，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是二十一世纪“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是“为人类求解放”，那么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则必然既以“为人类求解放”为其理论总主题，又必然不断延伸、拓宽、发展这一总主题的时代内涵，深度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三大分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又将如一道二十一世纪的思想闪电照亮人类解放的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又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方案。创造、丰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进程中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又是人类与自然、人类与自身实现“和解”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个总主题统摄三个分主题，三个分主题服从一个总主题，“一总三分”构成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并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彰显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时代魅力。

【关键词】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人类解放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②。继续深入研究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科学把握其理论主题，是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历史坐标的题中之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归根到底是由二十一世纪的时代主题或实践主题决定的，反映着二十一世纪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活动，以及二十一世纪世界历史自身演进的逻辑。二十一世纪在时间逻辑上是十九世纪合乎规律的延续和拓展，因而，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也必然是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合乎逻辑的延续和拓展。

纵然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

* 本文系教育部2022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世界发展大势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① 《中国共产党章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页。

义 500 多年的大历史视野来考察，今天的我们仍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因而，由马克思提出并回答了超越“政治革命”“政治解放”的“彻底革命”“人类解放”的问题^①的新世界观，至今仍闪烁着真理光芒。这一理论主题直到现在仍然指称一种未竟的事业。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沿用、赓续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并以这一理论主题为“元理论主题”，不断延伸、拓宽其主题内涵，不断赋予其以“巨大的历史感”和厚重的现实感，形成了饱含二十一世纪时代精神的理论分主题。

一、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人类彻底解放的现实进程，不仅丝毫不排除各民族国家的独立发展，反而以此为前提。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②。列宁进一步强调：“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矢志奋斗，是中华民族迈向社会主义“有自己的特点”的“走法”，是中华民族为人类解放、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拓展作出的贡献。在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意义越来越超出中国，而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主题之一。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中提出中国学研究应当“以中国为方法”，即“透过中国这副眼镜来观察欧洲，批判以往的‘世界’”，进而认为，“二十世纪是以欧洲为先进的世纪，而二十一世纪则将在亚洲和欧洲齐头并进之中拉开帷幕。并进并不是指挤入先进行列，而必须是从先后的纵向原理向并列的横向原理的转换”，“把中国作为方法就是要迈向原理的创造——同时也是世界本身的创造”^④。沟口雄三的“以中国为方法”，实质在于扭正“近代中国落后像”，澄明“旧中国基体”的历史延续性。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正是在选择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及其世界意义才得以充分彰显，“以中国为方法”的现实可能与必然也才能在二十一世纪被创造性地得到彰显，从而提高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现实的存在关系总是表现为一种“为我”的关系，“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⑤。近代以来，当世界历史大潮席卷而来时，世界

① 参见杨耕：《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理论基础和理论结构的再思考》，《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7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2页。

③ 《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3页。

④ 参见〔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132-13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3页。

的欧洲化已然不可遏制地扩展到世界的东方，中国及其一切传统都陷入了倾颓瓦解、被动挨打的历史境遇中，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从那时起，中华民族最大的“为我”关系，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民族复兴求索的开始阶段，西学东渐成了当时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主流认识。这时的“为我”关系表现为“被动为我”。从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致力于实现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本质上都是以西方现代化模板为参照来衡量中国。当时的中国总是需要以西方的标准来审度自身的发展程度，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西方文明强劲冲击了中国的一切。“东亚病夫”最为直接地刻画了中国疲敝的弱国形象，最为直接地显示了西方国家之于中国的傲慢心态。也正是从那时起，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的一切实践探索、理论创造、学术研究等都陷入了“学徒状态”。

中华民族有着强烈的复兴渴望。中华民族曾创造了具有悠久的厚度、开阔的高度、精髓的深度的中华文明。直到十八世纪，中华文明仍然位居世界前列，被视为“文明的典范”，欧洲的启蒙学者们也曾从中华文明中寻得打破封建神学精神禁锢的价值给养。近代以来的文明蒙尘，并没有使中华民族陷入消沉。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地投身于复兴求索中。正是近代以来的民族苦难，激发了中华民族求索复兴的坚定决心。马克思指出，在世界历史中，“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①。在世界历史境遇里，各民族可以看到“人类发展的主要使命”，从而有可能借由对特定历史环境的正确把握，实际地成为世界历史性存在。在世界历史大道上生成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其实现逻辑本身深深蛰伏在世界历史当中。作为一种“为我”关系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使“为我”同时包含“为中国”与“为世界”的双重内涵，只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身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伟大创举，才能从伟大梦想转化为伟大现实。

中国共产党高擎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的百年奋斗史，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为我”关系得到积极敞开的真正秘密。马克思主义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生发出的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最彻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光大、社会主义的兴起，构成二十世纪初期的世界发展大势。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被动为我”转向“主动为我”，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始面向世界历史。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②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笃信笃行马克思主义，并且自觉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创造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又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6页。

“主动为我”，从一开始就牢固贯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原则，是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一开始，就是在立足中国的同时，又包含胸怀天下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视野。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自觉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取得了“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历史成就，接续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史成就，先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提供了根本性社会条件、制度基础、体制保证、物质成就，以及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既切合中国发展实际，又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逻辑，更凸显人类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发展动能。

新时代以来的十年，中国更是在世界历史中创造了属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刻，以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质反衬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种种弊病。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已然实现了民族叙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叙事与人类社会发展叙事的辩证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壮阔的世界历史意义。

毛泽东在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二十一世纪的发展前景时指出：“进到 21 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① 当历史真实地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历史意义愈发凸显，毛泽东关于“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历史承诺得到了切实兑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历史性，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要策源地，“以中国为方法”成为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应然逻辑。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理所应当把理论的目光投射到当代中国，投射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中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叙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其思想体系的理论主轴。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目标指向，就在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的彻底解放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世纪关于人类命运的理论叙事。虽然那时马克思主义以理论形式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的前景”，以便能使我们“看到贯穿资本主义整个

^①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56 - 157 页。

发展过程和通向社会主义整个道路的红线”^①，但历史的现实注定是难以想象的曲折，人类的彻底解放注定要在历史长河中渐次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动标注了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二十一世纪的现实方案，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立场的时代呈现，由此确定了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社会化人类”目标在二十一世纪的贯彻

不晚于1845年，马克思已然摆脱了对其他思想体系，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世界观的依傍，开始了对以其名字命名的新世界观的创造。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一具有标志性的重要著作中，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②这就清晰表明，马克思主义在其思想前提上，是以“人类社会”为世界观原则的。这一世界观原则意味着马克思把理论探索的目光从天上王国转向人类世界，意味着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真正扬弃。如果说前者是之前的唯物主义者所一贯宣扬的，那么后者则造成了前者的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全人类解放的理论主题由此得到真正开辟。

众所周知，无论哲学家多么漠视人，漠视现实，其理论深处都包含对现实社会的立场。“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上的。他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③。而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者，最多只能机械地直观市民社会。这样一来，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都只是在市民社会的框架内解释世界。马克思则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把市民社会把握为物质生产关系，明确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而发展起来的。基于市民社会立场，在革命向度上最多只能触及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问题，在理论形态上只是或隐或现地为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辩护。马克思则站在人类社会立场，主张彻底的人类解放，由此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性克服了过往旧哲学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理解，从而超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合理化”确证，贯注着对全人类美好未来的期待。

作为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立场的新时代呈现。2013年3月，习近平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第一次在国际上阐述了“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毋庸置疑地成为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中的核心范畴、基本概念，其内涵得到不断充实、拓展、丰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饱含着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5页。

④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59页。

义对人类命运的深刻反思，从一开始就凸显着人类的总体立场，在其理论序列与实践建构中到处投射着对“人类整体”发展的深切关怀。正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各国，共同应对人类面前的惊涛骇浪，因而才在世界历史的张开逻辑中最大限度发挥对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领航作用。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二十一世纪深度拓展世界历史的客观需要

在马克思那里，历史转向世界历史已然成了一个“客观的事实”。这一事实之所以是客观的，就在于它是可以经验的。“砂糖和咖啡是这样来表明自己在19世纪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匮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①。而这一客观事实之所以是事实，就在于“历史转向世界历史”本身已然是一个事实判断。这一客观事实承载着纷杂的甚至于是根本对立的价值判断立场。作为世界历史的直接开拓者，西方资产阶级仅把世界历史视为为资本逻辑开辟道路的“工具”。也正是这样，1789年法国大革命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后，“一个刚刚开始解放自己、扫除自己各种成员之间的一切障碍、建立政治共同体的民族，竟郑重宣布同他人以及同共同体分隔开来的利己的人是有权利的”^②。而立足于人类社会视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则意味着为人类解放提供了现实的道路。“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③因而，世界历史的现实展开过程，注定不会有如“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那般笔直通畅，总是深深蛰伏着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斗争、旧制度与新制度比较、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

二十一世纪既是世界历史深度拓展的时代，又是世界历史矛盾景观错乱纷呈的时代，风险前所未有、机遇前所未有。世界历史向前推进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等趋势不断拓展，世界各国彼此依存、休戚与共，世界人民前途命运越发紧密地联结，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命运）共同体，人类生存的地球越来越成为“小小寰球”。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崛起，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壮大了世界的正义力量，成为塑造世界新格局的重要力量，蕴含在世界历史当中的“东升西降”趋势正显著地呈现出来。世界历史的前进步伐面临着重重挑战。全球贫富差距拉大、全球地缘政治对抗加剧、全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全球治理困境加深……全球新老热点问题层出不穷、此起彼伏，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一些老牌西方资本主义强国自囿于资本逻辑、利己原则，奉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妄图建构经济与技术的新殖民形态。特别是西方世界逆全球化兴起、政治极化明显、区域一体化逆转、“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发、民粹主义抬头，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9页。

并呈现出全球蔓延态势。这充分暴露出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对全人类前途命运的漠视。站在对全人类前途命运充分负责的高度，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准确把握二十一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时与势、喜与忧，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畅言与行动，为拓宽世界历史发展的正义道路提供了指引。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二十一世纪的伟大实践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非常明显，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①。曾几何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西方中心论”历史性地确立并巩固了在全球具有绝对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具体指称为“普世价值”。在这种意识形态叙事语境中，“世界上各主权国家只要出现政治动荡、经济落后和文化不昌等迹象，都可以被归结为没有遵循西方价值观和规则的必然后果”^②，以至于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发生时，持历史终结论观点的福山断言，很难想象在未来会出现一个比资本主义世界更好的世界。这样的价值立场决定了“普世价值”只能是抽象价值，而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及其丛生的矛盾景观更加凸显了“普世价值”的抽象性。这种抽象性最为鲜明地表现为“价值不对称”。且不论世界历史建构初期的血腥殖民贸易，仅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推行的表征“普世价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已然无可避免地引致了一系列全球治理危机。事实证明，“普世价值”不仅不“普世”，反倒“反噬”了奉之有如圭臬的国家的原有价值依靠，从而使这些国家陷入了“无根”的价值飘零的时代窘境。

在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视野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地包含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于人类社会立场，旨在凝聚全球治理价值共识，根本超越了西方抽象的“普世价值”，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绝不是要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再度置于“普世价值”的抽象意义上，而是说这样的价值观念是基于“全人类”的发展而定向的，具有丰富的历史性内容，这样的内容向度要自觉地、真实地体现在全球治理秩序的革新过程之中。关键在于，新型国际秩序建构及其作用发挥真正符合全人类发展权益，必须从全人类的命运前景出发，最大程度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从而历史性地克服资本逻辑、强权逻辑的负效应。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绝不是要重走“普世价值”的“强加式”“战争式”弘扬路径，而是要在相互尊重的包容开放“关系语境”中，赋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价值理念以具体历史内涵，尤其是要体现各民族国家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立场、价值主张、群众愿望，让全人类共同价值成为沟通世界的价值桥梁，成为人类共识的价值凝结。

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构建、生成过程中，而这种生成和构建不是脱离世界历史而独自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40页。

^② 王立胜：《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逻辑、现实表达及其内在问题》，《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2期。

的。在二十一世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另起炉灶”，而是要自觉占有资本主义现代世界秩序的合理创造，深度影响世界治理结构的革新改造。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必须自觉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规律性，顺势而为，把握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制度历史演进、并存与较量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大势，不断增强历史主动。

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

如果说，人的解放不能一蹴而就，那么，这种解放就必然呼唤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从而显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景象。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从而成为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支点与主题。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反映了二十一世纪的文明特征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社会形态是对社会制度的总体概括^①。社会形态文明实际上就是社会制度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只有被当作制度文明来理解，才能全面把握这一新形态的文明要义。作为一种新制度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制度文明，而非资本主义制度文明。但无论如何强调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属性，都不能忽视其生成的基本历史背景，即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长期并存中创造的。自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被马克思科学揭示以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不再是空想。十月革命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铁板一块”式的历史局面，开启了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新纪元。中国也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革命定向，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的历史征途。但历史已然反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是长期的，这也就决定了两种制度长期处于并存的历史必然性。

正是基于“两制长期并存”的世界制度格局，人类社会的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转向了“和平与发展”，并由此开拓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空间。“战争”是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内的例行原则^②，是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铁律。战争思维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家、思想家、政治家的底层思维逻辑。马克思主义正确地将社会革命的正当性、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以时代之问的形式标示出来。列宁则基于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世界历史格局分析，以“战争与革命”来概括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主题。二十世纪下半叶，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迈入一个有别于战争与革命主题的历史新阶段，“两制”长期并存的历史图景越发清晰。这种“长期并存”决定了“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③。因而，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坚持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持以改革开放

① 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页。

② 参见田鹏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文明境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5期。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9页。

推动中国深度融入世界。

进入二十一世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自觉把握这一时代大势，在文明形态意义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创性地提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全新概念。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自觉坚守社会主义道路，自觉把握和平与发展时代大势中创造出来的。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身又为二十一世纪贡献了和平发展的文明方案，回应了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主题，彰显出迥异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掠夺、奴役、战争逻辑的“和平思维”。正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通过侵略战争来实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是关于掠夺、奴役、战争的意识形态术语。掠夺、奴役、战争阴霾的无尽纷扰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历史悲歌，让人类文明新形态意蕴中的“和平呼唤”更加成为时代的强音，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标注了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高度

1853年，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开篇提及了黑格尔的“两极相联”思想。按照黑格尔理解，“两极相联规律”反映了事物相互转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辩证运动规律，“是不可移易地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马克思进而指出：“‘两极相联’是否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且不论，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①即由“英国的大炮”引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将把革命的星火拓展到世界。马克思科学地说明，在世界历史时代，中国与欧洲或者世界的其他地方，不再是彼此无关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中华大地潜藏着激荡世界、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无尽能量。

在二十一世纪，马克思的设想成了铁一般的现实，并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式内容得以彰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落后国家有可能在世界历史境遇中实现跃迁式发展。正如早年马克思所预测的，有朝一日，相对落后的德国会“一个筋斗”先于发达的英法而处于欧洲解放的水平，晚年马克思又以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说明了俄国公社跃升式发展的可能性。但在世界历史中实现的“跨越式发展”，注定不会只是关涉某一民族国家自己的事情，而是必然要反映世界历史的前进目的，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从一开始就是面向世界历史的，本身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世界历史目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华民族被动遭遇世界历史而产生的“民族梦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找到了复兴之路——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被诠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直接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胸怀及其行动；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又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得到了文明表征，也意味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厚重的文明支撑。

换言之，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文明的意义上诠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拓展中国式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7页。

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价值，揭示了中国的发展之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文明意义，展现了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站在中国之外看中国”的世界历史思维与“站在中国之内看世界”的中国思维。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而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①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重要内容。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二十一世纪宏阔远景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展开”，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中国复写”。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人类文明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结晶体”，而是处于不断变化当中的“有机体”，具有内在的、必然的鼎新逻辑。而资本主义文明本身是人类文明演进的阶段性结果，并不具有不可移易的“自然必然性”，不可遏制地趋归因于更高的文明形态——社会主义。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决定性地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定向。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释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的制度走向时曾深刻指出，对于中国而言，欧美资产阶级老路是“走不通的”，社会主义以其“决然兴盛”的世界形态，总体展现出中国只有在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后，“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社会主义是思想体系，也是崭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②因而，社会主义不能被“收起”，而是要在中国大地得到充分“展开”，展现其青春于世界的磅礴伟力。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探索和成功确立，根本扭转了中国历史的基本走向，也历史性确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属性。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再版，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关注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形态、社会主义形态进行理性地批判、鉴别，从而形成、发展了中国形态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本表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再创造，总体上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文明同构性”，以社会主义的中国形态为人类文明发展带来了根本转折。

在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出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超越逻辑。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以“以人民为中心”超越“以资本为中心”，坚持以“共同富裕”超越“两极分化”，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超越“物质主义”，坚持以“和平发展”超越“对外扩张”，革除了“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论”等意识形态迷雾，构筑起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厚、深刻、深邃的文明逻辑。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的当代转换形态，生发于“历史的中国”与“当代的中国”的时空交汇处，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的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1、2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6页。

过程之中，体现于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人类文明新形态以社会主义的中国形态，在二十一世纪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从低谷到绽放生机活力的转变，以当代中国的文明实践展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光明前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构成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为时代主题的三个分理论主题。就其内生逻辑而言，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有一个共同的实践基础，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方式，必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解决“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吸收了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因此，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必然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观照，而实现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把握。

总之，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是一个“历史总体”，是“总理论主题”与“分理论主题”的辩证统一，其主题线索蕴含、展开、澄明于历史当中。正如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仍处在发展当中，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历史内涵必然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和历史创造中进一步拓展，并不断彰显其应有的巨大时代魅力。

（田鹏颖系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杨彬彬]